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北京社科精品文库（第2辑）

中国伦理思想史

（下卷）

罗国杰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北京社科精品文库（第2辑）

中国伦理思想史

（下卷）

罗国杰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伦理思想史：全2册/罗国杰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
（北京社科精品文库. 第2辑）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ISBN 978-7-300-21260-9

I. ①中… II. ①罗… III. ①伦理学史-中国 IV. ①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3729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北京社科精品文库（第2辑）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
罗国杰 主编
Zhongguo Lunli Sixiang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mm × 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70.5 插页 4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 151 000	定 价	280.00 元 (上、下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第六编 封建专制主义伦理思想的衰落 早期启蒙主义伦理思想的兴起

导 言/ 625

第一章 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伦理思想发展的新动向/ 629

第一节 道学封建专制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解体/ 629

第二节 社会道德风习的变化/ 633

第三节 早期启蒙主义伦理思想的产生/ 638

第二章 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者李贽的伦理思想/ 644

第一节 自私出于人的天性/ 645

第二节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 649

第三节 主张“自适”，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 654

第四节 “决时时进”的人生观及其深刻矛盾/ 658

第三章 具有早期民主意识的思想家黄宗羲的伦理思想/ 662

第一节 “心性统一”的人性论/ 663

第二节 以“天下之利”为道德标准/ 667

第三节 “豪杰之士”的人格理想/ 672

第四章 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家顾炎武的伦理思想/ 676

第一节 基于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性善说/ 677

第二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主张/ 680

第三节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立身准则/ 684

第四节 反对“以法为治”，主张“以名为治” / 688



第五章 宋明道学的总结批判者王夫之的伦理思想/ 692

第一节 基于进化社会历史观的道德论/ 694

第二节 强调“众私之辨”和对义的层次分析/ 700

第三节 “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 704

第四节 道德教育论和道德修养论/ 709

第五节 “以身任天下”的人生观/ 714

第六章 封建专制主义的猛烈抨击者唐甄的伦理思想/ 719

第一节 对封建专制主义道德伦常的批判/ 720

第二节 “天地之道故平”的道德主张/ 724

第三节 “救民爱人”的功利思想/ 728

第四节 “就好避恶”的人性论/ 733

第七章 颜元、李塉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 737

第一节 “理由功著”的功利主义/ 739

第二节 “舍形则无性”的人性论/ 744

第三节 强调“实学”、“习行”的德育论/ 749

第四节 “为天地造实绩”的人格理想/ 755

第八章 反对“以理杀人”的思想家戴震的伦理思想/ 760

第一节 “欲根于血气，故曰性也”的自然人性论/ 761

第二节 “以情絜情”、“情得其平”的道德主张/ 766

第三节 “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学说/ 769

第七编 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导 言/ 779

第一章 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准备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伦理思想/ 785

第一节 龚自珍的伦理思想/ 786



第二节 魏源的伦理思想/ 793

第二章 农民革命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冲击和封建顽固派的反动 ——太平天国时期的伦理思想斗争/ 802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冲击及其历史教训/ 802

第二节 曾国藩的伦理思想及其对太平天国道德革新的反动/ 813

第三章 中国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形成——戊戌维新时期的伦理思想/ 823

第一节 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地主阶级洋务派在伦理思想领域的斗争/ 823

第二节 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伦理思想/ 826

第三节 严复的进化论道德观/ 838

第四节 谭嗣同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激烈批判/ 848

第五节 梁启超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伦理学说中的贡献/ 858

第四章 中国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发展——辛亥革命时期的伦理思想/ 871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对封建道德的继续批判和资产阶级道德观的进一步发展 / 871

第二节 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伦理思想/ 875

第三节 蔡元培对近代资产阶级伦理学发展的贡献/ 889

第四节 章太炎伦理思想的革命特征和历史局限性/ 900

第八编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导 论/ 913

第一章 五四时期对封建道德的批判/ 918

第一节 陈独秀发起对封建道德的批判/ 919

第二节 李大钊深化了对封建道德的批判/ 927

第三节 鲁迅对封建道德的深刻批判/ 933



第四节 吴虞对封建礼教的抨击/ 942

第五节 胡适对封建道德的批判及其实用主义的伦理思想/ 950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962

第一节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962

第二节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传播/ 969

第三节 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传播/ 976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地主资产阶级伦理思想/ 983

第一节 梁漱溟的伦理思想/ 983

第二节 吴稚晖的伦理思想/ 996

第三节 张东荪的伦理思想/ 1011

第四节 冯友兰的伦理思想/ 1027

第五节 蒋介石的伦理思想/ 1046

第四章 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056

第一节 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 1056

第二节 刘少奇的伦理思想/ 1067

第三节 周恩来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贡献/ 1074

第四节 朱德的伦理思想/ 1079

第五节 瞿秋白的伦理思想/ 1083

第六节 张闻天的伦理思想/ 1089

第七节 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和结构/ 1095

后 记/ 1109



第六编

封建专制主义伦理思想的衰落
早期启蒙主义伦理思想的兴起



导 言

所谓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时期，是指明朝隆（庆）万（历）年间（公元1567—1620年）到清朝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近三百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时期。这是中国封建制度逐渐走向衰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与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思想发展相适应，在伦理思想领域里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封建专制主义伦理思想的衰落，早期启蒙主义伦理思想的兴起。这是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中国封建制度从春秋战国以来，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长足发展，到明朝中期已趋烂熟，进入了它的末期。从此，虽然封建经济也曾经回光返照，一度有过暂时的繁荣，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表面上仍貌似强大，但整个封建制度内里却腐朽了，它的总危机开始了。

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危机，首先表现在土地兼并的空前加剧，土地的畸形集中上。明朝建国伊始就开始实行皇帝颁赐庄田制度，这种制度以后愈演愈烈，以致肥田沃土，“悉为豪强占种”，出现了占田数千亩乃至数十万亩的大地主，而广大农民则“控诉无所”。清朝政权建立后，满汉大地主合流，封建专制统治不断强化。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了“圈地令”，允许清贵族和八旗兵丁强占民田。这种“圈地令”一直执行了40年，民田被非法侵夺者，从中央到地方，无法统计，仅畿辅被圈占的皇庄和旗地，就有163 400顷。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中披露当时土地高度集



中的情况说：“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与此同时，封建赋税也更加苛重。明中叶以来推行“一条鞭法”，积弊日深，无限制地增加田赋税收，其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以致“正供外有杂派，新增外有暗加，额办外有贴助”（《明史·黄道周传》）。广大贫苦农民“至有今日完租，而明乞贷者”，甚而“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顾炎武：《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广大农民破产流亡，造成农村经济破产和农业生产力严重萎缩。

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危机反映到政治上，则是君主专制高度发展，特务横行，封建统治更加残酷。明代中期，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由明初开始的特务政治恶性发展，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豢养了几十万职业特务。这些特务机关直接受皇帝指挥，上至朝廷大臣，下至里巷百姓，无不在其侦察之列，整个社会上出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道路以目”的恐怖气氛。清雍正皇帝以非法手段夺得皇位后，为了对付复杂的政治局面，他不仅无限地提高皇权，而且重演明代特务政治的故伎。同时，由于专制王权的高度发展，阶级斗争尖锐复杂，明清最高统治者大都猜忌成性，怀疑一切，因而大兴文字之狱。清康、雍、乾时期，文字狱发展到了顶峰，仅雍、乾两朝发生的文字狱就有一百多起。当时文网严密，罗织极细，杀人焚书，司空见惯，整个社会谈虎色变。封建专制制度反动腐朽的本质，暴露无遗了。

在封建制度腐朽没落的同时，资本主义萌芽也开始出现。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残酷，农村经济陷入危机，而城市工商业却因涌入大量廉价劳动力而有所发展。在东南沿海地区民营的纺织、造纸、制瓷、冶铁等手工业部门中，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当时以丝织业闻名的苏州，“比闾以纺织为业，机声扎扎，子夜不休”，而且“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这不但表明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有了一定的规模，而“计日受值”也表明实行的是雇佣工资制度。与此相适应，社会上也出现了劳动力市场，许多破产农民纷纷来到苏州，“引颈而望”，等候厂主来雇用。于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出现了。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在东南沿海、长江和赣江大三角地带的某些城市都先后破土而出，以致社会上出现了“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情况。资本的生活史在社会的两极分化中开始了。当然，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只是苍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同当时占优势的封建生产关系相



比，力量是十分微弱的，并且还受到沉重的封建关系的束缚，但它在其产生的地区却广泛地影响着其他社会阶层，成为促进封建制度瓦解的新的力量。

还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航海事业也日益发达。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德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先后向东方寻找殖民地，中西交通来往日益频繁。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进行活动。这样，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中又增加了一个外来的新的因素。

由于上述情况，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逐渐发生了某种新的变化，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由于各种矛盾的汇集和激化，造成了明清之际的整个社会的急剧震荡，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发展也因之出现了某种新的动向。

首先，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空前激化，反封建的农民战争大规模地展开。明代中叶以后，农民、“流民”、“矿徒”等的暴动，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终于汇合成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就有不少手工业工人和下层知识分子参加。起义军鲜明地提出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形成了“除暴恤民”、“均田免粮”的战斗纲领，终于推翻了朱明王朝，建立了短期的农民政权。这次农民大起义前后持续了46年之久，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刻是空前的。它充分地暴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性，也广泛地震惊了社会各个阶层，给这一时期伦理思想的发展以强大的推动力。

其次，新兴市民的反封建斗争也一度蓬勃兴起。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新兴市民（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中小工商业者）成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敌对势力。虽然这时新兴市民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明万历以来，由于农民日益破产，封建统治者转而加紧对城市工商业者的掠夺，垄断手工业原料，加重工商业税收，限制矿产的开发，派出大批矿监、盐监、税使到各地横征暴敛，因而激起了新兴市民的猛烈反抗。万历以后，江苏、山东、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江西、河北、云南等地大中城镇，先后爆发了数十次大大小小的市民暴动。他们抗税、罢市、夺矿，怒杀盐监税使，提出了初步的民主要求。这种市民反封建斗争的影响，同样不能不把“事实的真相”用强力塞进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头脑。

第三，由于明王朝的腐朽，关外女真贵族也开始武装割据，民族矛盾日益激烈。明朝灭亡后，降清派贵族官僚们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公然引清



兵入关，更使得国内民族矛盾急剧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反对清统治者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的斗争如火如荼，前后持续了几十年之久。这场抗清的民族斗争把一大批出身于地主阶级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卷入其中，斗争的实践使他们接触到社会现实和民间的疾苦，成为新思想萌发的酵母。

就这样，明清之际，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农民大起义和市民运动错综交织，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犬牙交错，整个社会风雷激荡，呈现出一个“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局面。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新的阶级和阶级意识尚未形成，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治分化却加剧了。早在万历年间，一部分在野的开明地主及其知识分子，面对封建制度的危机，纷纷组织各类文化、政治团体，讲学议政，抨击朝贵，要求消除弊政，改变现状。这类团体中最著名的，前有“东林党”，后有“复社”，它们反对封建腐朽集团的斗争，直接表达了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政治要求，也多少反映了市民阶层争取平等权利和发展自由经济的愿望。而明王朝的覆亡，清贵族的人主中原，更是使这些在野的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震惊于民族的危机和政治的变局，他们对汉民族自取败辱深感悲愤，“哀其所败，原其所剧”（王夫之语），感到当时“已居不得不变之势”（顾炎武语）了。在文化思想上，他们也意识到“六经责我开生面”（王夫之语），必须“推故而致新”，对于“百千年同迷之局”，不能随声附和，而要“驾一叶之舟而欲挽其流”（颜元语）。于是他们力图利用自己的文化素养，对他们所认定的导致明王朝覆亡、社会腐化、风俗陵夷的种种弊端，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和自我批判。他们还从农民战争所展示的社会矛盾运动中，探寻历史发展的轨迹、政治改革的方向和民族文化复兴的未来。这种自我批判和历史反思把他们引向了对统治宋明数百年之久的道学唯心主义及其封建专制主义伦理思想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他们虽然没有摆脱旧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却阐发了不少具有发展潜力的新思想，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成为这一时期新思潮的承担者。



第一章 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伦理思想发展的新动向

第一节 道学封建专制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解体

封建制度的衰落表现在思想上，就是道学伦理哲学唯心主义体系的瓦解。中国早期启蒙主义伦理思想就是在这个瓦解过程中孕育并作为其否定因素而产生的。

道学伦理哲学思想体系形成于北宋二程（程颢、程颐），集大成于南宋的朱熹，它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占统治地位的伦理哲学思想，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伦理道德支柱。

宋明道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体系，是以佛、道的宇宙论、认识论和心性论的思辨方式来重新论证、再建以封建等级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孔孟之道的产物。程朱把现有的封建等级伦常秩序无限地吹胀，将其抽象化为脱离现实、超越时空的本体“理”或“天理”。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朱子语类》卷一）又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读大纪》，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由此，程朱运用佛、道的思辨方法和思想资料，阐发了一整套关于理气、道器、格物和致知、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人心和道心、天理和人欲的理论。在这套理论中，宇宙论是它的开



头，伦理学是它的主题，认识论完全屈从于伦理学，而人性论则是其沟通天人、从宇宙论过渡到伦理学的中心环节。这种天（宇宙）——人（伦理）——天人合一（伦理本体的复归）的理论框架，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应当”（封建等级伦常秩序）等于“必然”（宇宙规律）。在程朱看来，既然“三纲五常”封建道德是宇宙普遍规律“天理”的体现，那么它就是合理的、永恒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下之定理”，是人们必须遵循、服从、执行的“绝对命令”，谁违背了它，就是“伤天害理”，就会“天理不容”。人生的目标就在于接受封建道德教化，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自我道德修养，以达到对这个封建伦理本体的大彻大悟。

然而，宋明道学一开始就埋下了它内部分裂的伏线，隐藏着导致它最后瓦解的否定因素。马克思在揭露唯心主义思辨结构时曾经指出：“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① 宋明道学也是这样一种思辨的结构。道学家所谓的“天理”，实际上不过是大地主大官僚的理性。道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把这个“无人身的理性”颠来倒去，安置、对置、结合的产物，朱熹就所谓“理”、“物”、“心”的关系打了一个比方：理是父母，生出两个儿子，在外做事的是“物”，在家的是“心”，物和心都是理的体现；万物“皆完此理”，都是理的“安顿处”，而心则“具众理而应万事”；人们只要通过“格物穷理”，“存理灭欲”，就能“复其初”，恢复本然的“义理之性”。“性即理也”，复性也就是对作为封建等级伦常秩序的伦理本体的大彻大悟，只不过在这种思辨结构中，程颐和朱熹更强调理与心的对置，在哲学上表现为客观唯心主义。

但是，道学这种思辨结构同样可以强调“无人身的理性”同人心的结合，这一点在程颐那里已见端倪。到了南宋，陆九渊终于把“理”从天上拉了下来，同主体的“心”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因而在道学内部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派别，形成了南宋的朱、陆之争。这种争论的目的是争夺封建正宗地位，但两者的社会本质并无二致。黄宗羲就曾经指出：“二先生（朱熹和陆九渊）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见智，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于圣人。”（《宋元学案·象山学案》）朱陆之争从哲学上说，是唯心主义内部的争论；从伦理学上说，两者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等级伦常秩序。只不过朱熹更强调封建道德的绝对权威和人们接受封建道德灌输的必要性，而陆九渊则强调提高人们履行封建道德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朱、陆之争前后持续了十几年，理论上最后他们以互不相让、各持己见而告终，但实际上程朱理学却占据了正宗地位。南宋理宗把朱熹追赠为太师，加封为信国公，后改为徽国公，并配享孔庙，从此程朱理学被奉为封建社会的官方思想，朱熹的著作成了宋、元、明三代进行教育、选拔官吏的钦定教材，朱熹的言行成为判断人的言行是非的法典，以至整个社会出现了一个“六经尊孔孟，百行法程朱”的局面。惟其如此，程朱理学也越来越僵化了。一般封建士子只会墨守程朱的陈条旧义，以猎取功名利禄。程朱理学在理论上再不可能有什么发明新意了。到了明代正德年间，王守仁为了“破心中贼”，挽救明王朝统治于“病革临绝之时”，起而反对程朱，张扬陆九渊，完成了道学内部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体系的构建。王守仁心学体系的产生，标志着宋明道学的瓦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伦理思想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王守仁也讲“理”，这个“理”也是以三纲五常封建等级伦常秩序为内容。但程朱以“理”为“天下之定理”，强调“天理即天命”，并说“命犹令也”（《四书集注·中庸注》），“命犹诰敕”（《朱子语类》卷五），把“理”说成是“一定不可易之物”，是由某一个“有德之主”规定的“绝对命令”。这种外在强加的“定理”到了王守仁这里，由于同“心”合而为一，其存在状况就发生了变化了。王守仁虽然也把“心”、“良知”、“灵明”抽象地提升到超越形体物质的先验的高度，但他认为“良知”就如同规矩一样，可以依它画方形、圆形、直线的形状，无论其多大多长，把“良知”发挥到事事物物之上，其所指定的理可以因时、处、位的不同，表现出无限的多样性来。王守仁以“良知”为自家的准则，虽然其本意是企图把封建统治秩序直接安置在人的心中，但结果恰恰相反，从这里却可以引申出“一个千变万化活泼之理”，并且把运用“理”的主体由在上的“有德之主”下放到一般的老百姓，导致两种不同的理的对立，后来的李贽就是这样前进的。这就是说，从程朱的“理”到王守仁的“心”，道学虽然还是道学，但它已走向自己的末端了。

不仅如此，道学的衰落还突出地表现在人性论的变化上。人性论是道



学沟通“天”、“人”，从宇宙论过渡到伦理学的关键。程朱在构建其理学体系时，提出了“性即理也”的命题，特别强调“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认为“义理之性”才是“得天地之理”的产物，人之所以异于物者，就在于人有异于物的“形气之正”得以贯彻履行“义理之性”，从而“全其性”。这样，宇宙论落实到了人性论，“理”也就落实到了“性”和“命”。“义理之性”（封建纲常）是对人们先验的必然要求和规范，它与来源于“气质之性”的人的感性、功利相对立。但是程朱又讲“心统性情”，把“心”分为“性”和“情”两个方面。尽管程朱反复论证了“道心”和“人心”的对立，强调用“道心”统率“人心”的必要性，但是如朱熹说的，为了不落入“释老之学”的窠臼，使合“天理”的“道心”有一个“安顿处”，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人本一心”，“道心”不能离开“人心”。程朱对“心”的这种双重性的假设，就不能不使自己的理论陷入矛盾。因为既然性与情、道心与人心，也即伦理和自然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世界，但又要求它们一致、交融，甚至同一，显然是十分艰难的。这个理论上的矛盾到了王守仁这里，由于“心”被提到最高范畴的地位而被克服了，但另一种危险性接踵而来。王守仁说：“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传习录》上）。“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传习录》中）。这就无异于把程朱的由“理”、“性”而“心”，由“性”而“情”的逻辑顺序颠倒过来。显然，王守仁的这个能视听言动的物质性的心完全可能成为“性”和“理”的依据和基础，而原来处于主宰、支配地位的“理”也完全可能成为“心”和“情”的引申和派生物，王守仁本人未必意识到这种后果，但他强调“心”和“身”不能分，逻辑上必然使“理”愈益同感性情欲纠缠在一起而世俗化。至于他把“良知”作为一种感性心理原则加以宣扬，则不能不使“理”日益染上感性情感的色调。这样，王守仁开辟了与道学相反的一个逻辑轨道。于是到了王门后学特别是泰州学派那里，朱熹早就担心的危险终于发生了，“义理之性”被“气质之性”所取代，感性情欲作为“气质之性”的内容被突出出来，日益占据着“善”的地位，道学的天理人性论不可阻挡地朝着自然人性论前进。

还有，王守仁把“理”与“心”合而为一的同时，又十分强调主体道德精神的能动性。他曾经大声疾呼：“今天下事势如沉痾积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实有在于诸君子。”（《与黄宗贤》）他强调主体的能动精神是为了“破心中贼”，这是他的“真情”。然而，他讲“知行合一”论时提

